

接受与书写：

Jieshou Yu Shuxie:
Tangshi Yu Qingdai Mengguzu
Hanyu Yunwen Chuangzuo

唐诗与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

米彦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接受与书写：

Jieshou Yu Shuxie:

Tangshi Yu Qingdai Mengguzu

Hanyu Yunwen Chuangzuo

唐诗与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接受与书写：唐诗与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 / 米彦青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4

ISBN 978 - 7 - 5161 - 4920 - 1

I. ①接… II. ①米… III. ①唐诗 - 影响 - 蒙古族 - 少数民族文学 -
汉语 - 韵文 - 诗歌创作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07.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87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 09YJC751049)

内蒙古“草原英才”专项资金资助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领军人才”项目基金资助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唐诗影响下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之家族性特色	(5)
第二节 唐诗影响下的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的动因与蒙汉文化交流关系	(9)
第一章 奇崛蒲松龄创作中受到的唐诗影响	(22)
第一节 蒲松龄诗歌中的唐诗接受	(22)
第二节 蒲松龄赋中的唐诗影响	(29)
第三节 蒲松龄词对唐诗的接受	(32)
第二章 学者博明的唐诗传承	(34)
第一节 宦海颠沛的博明	(34)
第二节 《西斋偶得》中的唐诗接受	(37)
第三节 博明创作中因袭的唐风	(41)
第三章 天才梦麟文学绮梦中的唐诗因子	(50)
第一节 梦麟诗歌思想内容中的唐诗传承	(50)
第二节 梦麟诗歌艺术风格的唐诗影响	(56)
第四章 杰出学者法式善及其家族的唐诗接受	(64)
第一节 法式善诗论中的唐诗观	(66)
第二节 法式善诗作的唐诗接受	(74)
第三节 法式善家族创作中所受到的唐诗影响	(84)
第四节 来秀词中的唐诗轨迹	(89)

第五章 唐诗对和瑛家族的文学创作的影响	(92)
第一节 和瑛与他的《易简斋诗钞》	(92)
第二节 和瑛《西藏赋》中的唐诗影响	(101)
第三节 和瑛家族文学中的唐诗接受	(104)
第六章 明安后裔的家族性唐诗接受	(113)
第一节 博卿额诗歌中的唐音	(113)
第二节 国柱、国栋兄弟对唐诗的传承	(117)
第七章 清前期唐诗接受史上的吉光片羽	(123)
第一节 色冷、嵩贵诗作中的唐风	(123)
第二节 松筠对唐诗时政特色的传承	(127)
第三节 清前期蒙古族诗人断章的唐韵流风	(131)
第八章 变动的道咸间托浑布、花沙纳、恩孚的唐诗接受	(135)
第一节 托浑布对唐诗的袭风	(135)
第二节 花沙纳的唐诗接受	(140)
第三节 恩孚的唐诗接受	(142)
第九章 不幸文人柏葭及孙崇彝的唐诗接受	(146)
第一节 柏葭诗歌中的唐风	(146)
第二节 柏葭赋的唐诗接受	(152)
第三节 崇彝诗歌创作中的唐诗接受	(153)
第四节 崇彝词对唐诗的接受	(160)
第十章 晚清恭钊、瑞洵和锡缜、锡纶家族诗词创作的唐诗接受	(164)
第一节 恭钊诗歌中的唐诗传承	(164)
第二节 唐诗对恭钊词作的影响	(171)
第三节 瑞洵对唐诗的接受	(174)
第四节 锡缜诗歌中的唐诗余韵	(176)
第五节 锡缜词的唐诗接受	(186)

第六节	锡纶诗歌中的唐影	(188)
第十一章	清后期八旗驻防起家诗人瑞常、贵成、清瑞、白衣保、 倭仁、恩泽、成多禄等创作的唐诗接受	(192)
第一节	杭州驻防起家的瑞常和贵成	(194)
第二节	京口驻防清瑞的唐诗接受	(201)
第三节	荆州驻防起家的白衣保和恩泽的唐诗范式	(203)
第四节	河南驻防出身的倭仁诗歌中的唐诗品格	(211)
第五节	吉林驻防起家的成多禄的唐诗沾溉	(213)
第十二章	咸同光时期杜甫诗歌影响下的叙事诗人柏春和延清 ...	(217)
第一节	杜甫诗歌叙事手法对柏春的影响	(217)
第二节	杜甫对延清诗歌创作的影响	(222)
第十三章	晚近诗人三多、升允的唐诗接受	(245)
第一节	三多诗歌的唐诗接受	(245)
第二节	三多词的唐诗接受	(263)
第三节	升允诗歌中的唐风	(267)
第十四章	清代蒙古族女性创作中的唐诗接受	(271)
第一节	有意工文章的那逊兰保	(271)
第二节	闲阶爱月明的成瑩	(281)
第十五章	晚清俊彦残编中的唐诗接受	(282)
第一节	光宣诗影中的唐诗接受	(282)
第二节	晚清余晖中的王者诗思	(285)
结语		(290)
参考文献		(295)
后记		(303)

绪 论

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者对唐诗的接受，是与其生活时代的诗坛导向有着密切关联的，而选择这一课题作为研究对象，与当下的接受研究密不可分。

为接受美学奠定哲学基础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任何存在都不能超越一定历史环境，都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定在”。存在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规定了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历史具体性——我们认识、理解任何事物，都是以自己已有的先在、先见、先把握，即意识的“先结构”为基础，进行有选择、有变形的吸收^①。接受史研究属于批评学，它要求在系统的史料整理的基础上，从审美的、理论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思考，以求对本文意义获得更深的理解，然后在深入理解的情况下，通过对个体诗人在诗史上的接受状况的研究，从而对诗歌创作、诗学原理和接受规律诸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蒙古学者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从元至清，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相当可观的。在清代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近百名，刻有诗集或词集的作家近三十名，创作从清初到清亡二百多年间，前后衔接，不断有作品问世，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蒙文书面作品，仅清初以来的蒙古文人的汉文创作已十数倍于后者。以乾嘉间的著名作家法式善为例，现存诗作七千余首，为文多卷，笔记杂著若干部，合为六十余卷，诗话十七卷，不包括其他所辑诗文集，就已经与清代全部蒙文书面创作的数量不相上下。此外，像博明、松筠、和瑛、恭钊、柏葭、崇彝、锡璜、延清等，俱以丰赡的创作见称于世。

古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不但有三千年的悠久历史，

^①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9—197页。

而且诗歌的体裁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有过辉煌的全盛时期，产生过许多不朽的名作。由于历史积淀、心理接受度等方面的影响，唐诗早已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标志着诗歌这种文学样式达到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中最值得自豪的瑰宝。唐诗的繁盛是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者对其主动接受的一大动因，而唐代对胡民族文化的吸取和接纳以及唐王朝与胡族的关联，也是唐诗受到蒙古族诗人格外推崇的重要原因。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陈寅恪亦认为：李唐家族“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①。因为浸染胡人血统之故，唐廷一直对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视同仁。唐太宗尝自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②由此，北方少数民族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李唐王朝因其皇室血缘浸染渐致的开放心态，使得整个国家和国民具有着不同以往的广阔胸怀。并且，唐朝诗人群体本身也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组成。“在大一统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唐诗人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文人的特点。首先，在民族构成上，很多著名诗人是少数民族出身，或者是汉化已久的少数民族。如白居易出于西域，元结、元稹、独孤及出于鲜卑等。而大诗人李白的出身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胡怀琛认为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国人。”^③唐朝诗歌创作的辉煌性和唐代诗人的多民族性都是清代蒙古族诗人进行汉语韵文创作时接受唐诗的源流背景。

从母题学角度看，一部诗歌史就是一部原型母题的演变史。“历史的进程是由那些不断重复的原型组成，不管是人物原型还是事件原型。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人们都可以根据某种熟悉的模式去考虑它们。”^④当然，诗歌史上原型母题的演变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必然会随着时间、情境、创作个性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诗歌史上唐诗这个原型母题，遵循个体生命的进程经历了诸阶段的发展演变。因此，唐诗母题史的

①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4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10页。

③ 郎樱、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④ 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接受不仅可以用于宏观民族文学史的研究,同样可以用于微观个体创作史的研究。从清代诸多蒙古族诗人的创作来看,其作者身份从政治家、边疆大吏到普通文人,从接受艺术风格来看,唐诗这个母题经历了“雄奇”、“清雅”、“高古”、“绮丽”、“温婉”等诗风的生命旅程。就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的唐诗接受史来说,在蒙古族诗人进行汉语创作时,他们在有意或无意地接受着唐诗人的作品题材、风格、体式、语言等显性文化遗产时,其实,那其中所蕴含的诗人的精神气质和真实的人性,已经成为接受者的精神家园。

唐诗带有浓郁的对生命世界的体验沟通的意味。对唐诗的接受,就是要尽可能地体验和想象彼时的社会、历史和诗人。揣摩诗人们如何以自己的强大创作力塑造着灵动的世界,并赋予生命于无数个永恒的瞬间。清代蒙古族诗人大多久居政治文化中心,他们中的很多人又曾经宦游南北,草原文化和正统文化在他们身上奇妙地结合。因其生命的律动,在接受唐诗的过程中也呈现更为丰富的多样性。考察清代蒙古族诗人汉诗诗作,主要表现在清代蒙古族诗人们对唐人生活态度的认肯和歌咏,对王孟体、太白体、杜子美、元白体及晚唐体的仿效和词语的袭用。具体到个体诗人,则突出表现为梦麟对太白慷慨激昂、志高思奇的诗歌精神的吸取,法式善、和瑛、瑞常、白衣保对王孟清新逸俗的诗歌范式的追摹,梦麟、柏葭、松筠、延清、柏春、锡祺锡纶兄弟对杜甫沉郁顿挫、句实语奇的诗史精神的承传,蒲松龄、贵成对元白诗、晚唐皮陆讽喻特质的体味,恭钊、瑞洵、花沙纳、恩孚、崇彝对温李的细腻情思的继承,三多对杜牧俊爽诗风的追摹等几大方面。

钱穆先生认为,文学的最高成就,来自内心修养、情感锻炼、文化精神三位一体的融凝合一,“故所谓性灵抒写者,虽出于此一作家之内心经历,日常遭遇,而必有一大传统,大体系,所谓可大可久之境,源泉混混,不择地而出。在其文学作品之文字技巧,与夫题材选择,及其作家个人之内心修养与夫情感锻炼,实已与文化精神之大传统,大体系,三位一体,融凝合一,而始成为其文学上之最高成就”^①。清代蒙古族诗人在学作汉诗时,对唐诗的共同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学术思想之一端,清代蒙古族诗坛的发展与繁荣,说明了“少数民族文人起到的胡汉文化

^① 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论丛》,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增订版,第42页。

交融的桥梁和先导作用，把拙朴浑厚的文学美学特质带进了诗文殿堂”^①，起到了民族和文化融通的作用。而与汉文化融通后的本民族“文化精神之大传统大体系”也就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可以言志的诗歌里。无论是对唐诗生命哲学的理解，还是对唐人生活状态、生命价值的解读，无论是影承，还是化通，也无论是否达到深刻而圆熟的境界，都可看作蒙古族诗人理解和接受唐人及其唐诗的努力，为清人接受唐诗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更好地接受唐诗铺垫了一条既包含哲理启示又充满生命体验的道路。这种浸染着浓厚异族色彩的解读，是清代唐诗接受史上尤可重视的一环。

清诗词是中国诗歌史和词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有清一代作家人数众多，作品丰富，内容充实，现实意义强，艺术个性鲜明，成就斐然。清代汉族韵文成就必然会影响蒙古族汉语创作，因此，在清代蒙古族文坛上也成就了一批汉语创作者。对于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的研究，在国内早已展开，只是大多数研究仅限于对个体诗人诗作的整理和诗歌风格的概述性的研究，对具体时期诗人创作中所受到的唐诗的影响未能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的整体风貌亦未能考镜源流。笔者曾对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唐诗接受做过系统研究，而此书则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对跨文体的唐诗接受做出的一番探索。所谓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主要包括汉语诗、词、赋的创作。本书探讨唐诗对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的影响，在如下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绪论中将清代蒙古族诗人汉语韵文创作不同历史分期中对于唐诗接受方面的文献整理和海内外研究成果做了详尽的综述，梳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研究脉络，并以时空为经纬，将不同历史时期中或同家族或同地域的诗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归纳分析，着重强调了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在其间的重要性，并就此做了陈述。正文分为十五章。按照时代顺序依次论述代表性个体诗人的唐诗接受状况。先后计有蒲松龄、梦麟、博明、法式善家族、和瑛家族、明安后裔诗人群、道咸诗人群、柏葭家族、恭钊家族、八旗驻防诗人群、延清、柏春、三多、升允、那逊兰保、旺都特纳木吉勒家族及诗作较少的诗人群体性研究。

① 刘跃进：《北朝民族文学叙论·小引》，高人雄：《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上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页。

第一节 唐诗影响下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之家族性特色

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的数量十分庞大,其中占相当比重的当属诗作。清代蒙古族的汉语韵文创作形象地反映了清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风貌,其内容除涉猎蒙古族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包括蒙古社会以外的广袤天地,举凡国政朝章、文苑掌故、征战工役、生息劳作、山川风物尽罗其中。在这些韵文的写作中,值得注意的是,家族性写作研究在清代蒙古族的汉语创作中日渐显现其重要性。

家族文学研究在近年的文学研究中渐成显学。家族,尤其是文化家族对文学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在家风、家学和家脉三个方面。家风对文学家的影响在于精神指向方面,家学对文学家的影响在文化修养、创作内容及其文学风格方面,家脉则在组织形态和互动势态上直接影响文学创作。^①清代蒙古族文学的日趋繁荣,促进了一批文学家族的产生。而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家族文学因其民族融合中的文化地位及文学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 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概况

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早在清初开始萌芽,因为蒙古族家族势力的营建没有形成大的规模,所以文学传承有限,为文献典籍记载者数量并不多。至乾嘉时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日趋繁盛,在日渐注重才情声望的汉族社会风气导引下,蒙古族家族为了提高门第威望,也开始注重家族成员的文学修养,他们或以理学相标榜,或以文学享誉社会,因而清中期至晚期出现了不少规模较大的蒙古族文学家族。知名者如以诗文著称的法式善、来秀祖孙;以诗歌写作著称的和瑛、璧昌、谦福、锡珍家族;博卿额、国栋、国柱、文孚家族;柏葭、崇彝祖孙以及恭钊、瑞洵叔侄和族侄锡缜、锡纶兄弟;喀喇沁王爷旺都特纳木吉勒、贡桑诺尔布父子。这些家族或出自功臣后裔,或是官宦世家,在清代政治、文化等领域皆有较为显赫的地位或持久的声望,也正因此,这些家族的学术

^① 罗时进:《前言》,《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文化优势才得以建立和凸显。

其中，和瑛、博卿额俱是蒙汉文兼通，两种语言著述皆擅。法式善家族、和瑛家族、博卿额家族、柏葭家族、恭钊家族均在入清后以科考起家，代代显宦不绝。这些家族因为有着很好的文化传承和文学修养，家族多能文之士，文学创作也较为丰富。这些文学家族，无论是从军功起家，还是贵族后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仅仅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考察，他们都集政治、学术于一体，家族的文学特征往往被他们的政治性遮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研究遭遇的冷落。而且相对汉族文学家族而言，随满清贵族入关的蒙古族家族，来源往往驳杂，有武功、贵族，他们向文化士族的嬗变，既是由于和汉族融合的要求，更多是迫于社会环境和生存压力的无奈选择，与汉族士人营建起来的文学家族相比，他们的文化底蕴和文学成就略显逊色，家族的持久性也没有那么久远。

二 文学家族的文化教育及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钱穆曾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在影响文学家成长和创作的各种因素中，家族占据基础核心的位置，具有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庭是最古老、最深刻的情感激动的源泉，是他的体魄和个性形成的场所。”^①文学和家族之间所存在的天然的、密切的、深度的联系，实际上正是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瞻望家族文学研究开拓和发展的方向。

无论是由士人发展而成，还是从武将转变而来，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都非常注重家族的文化教育，这主要包括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两个方面。这种有意识的文化教育，正是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温床。

文学家族的文化素养教育自不待言，顺康以来，社会上大兴儒学，形成了日渐注重才情声望的社会风气。生活在汉文化氛围中，满蒙世家大族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一个家族没有一定的汉学文化修养，即使在政治上称

① [法] 安德列·比尔基埃：《家庭史》第1卷，袁树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雄一时，也难以被整个社会接受。

文学家族兴衰与科举密不可分。在门第社会中，祖宗的功德可以成为泽被后代的强大力量，门第高望的家族后代们，常常不必努力就能坐享其成。但要将这种家族威望持续下去，依旧需要后人的努力。所以，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成员都积极参与科举考试。清代少数民族科宦家族的大量出现，促进了整个朝代文学家族的繁荣。“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文学才能的培养，而一旦这些士人进入文学的交际圈，也许他们就影响了当时文学发展的面貌。”^①清朝定鼎北京二百六十多年间，从顺治二年（1645）开科考到光绪三十年（1904）止，其间从未中断，科考陆续所取蒙古进士不下百人，举人又数倍于此，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颇有才气的诗人。清官学也每年从蒙古各旗定期选拔生员，送国子监、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以及八旗各属下官学就读深造，这些入学生员大多娴熟经典、兼擅辞赋，许多人成为一代名家。

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从清初到清代中期，明显地由尚武转向崇文，即由军功入显向文学家族转变。无论是和珅家族还是法式善家族，他们的祖上在后金时期均是任武职者，并且以军功致显。入清以来，清世祖偃武兴文，崇重礼乐，特别是圣祖柄政后，更是大力推行科举制度，满蒙贵族为了保族，也随俗雅化，与时俱进，投身到科举进士竞争的行列中。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科举考试普及，而且有满蒙汉举之分，但因为大量居住在东北或代北的蒙古语言环境中的百姓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并不能通过科举入仕，因而也就没有机会学习汉语，用汉语进行创作更是无从谈起。这样，进行汉语创作的蒙古族文学家族主要由蒙古官员或蒙八旗成员组成。因为，除了在京师供职的蒙古官员之外，蒙古八旗散驻各地并屡有迁徙，由于久居汉地，耳濡目染，从语言到习俗均产生了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才学德识对于家族的文化地位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文化上的优势对于取得和维护家族门户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上举这些少数民族家族对于家族的文化教育非常重视。法式善曾记载母亲对自己的教诲，“太淑人戒条甚密，一篇不熟，则不命食，一艺不成，则不命寝。太淑人亦未尝食未尝寝也”^②。家族长者的身教言传对

^① 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 （清）法式善：《先妣韩太淑人行状》，《存素堂文集》卷四，嘉庆十二年（1807）王墉刻本。

后人影响深远。从这里也可看出，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已经很注重学术追求及家族内部的文化教育。和瑛之孙谦福，以萧然散淡为生活旨趣，但并未因自己退出吏事而不关注民生，在寄给兄长的诗中，他曾说：“欲谈诗务嫌多事，无补生民即废材。寄语长公须努力，方今圣世正需才。”（《重阳日得月川兄书即赋长句寄呈》）给儿子的诗里，他又谆谆嘱托，“累叶吾门诗水清，青毡故物旧儒生。家贫尚有书千卷，儿好何须金满赢。莫以疏慵志温饱，要期远大励功名。眼前画地原堪守，可惜鹏搏九万程”（《示锡庄》）。这首诗表达了前辈对后来者的真情嘱托和谆谆教诲，也可看出清代中后期的蒙古族家族成员对家族的道德教育的重视和对家族发展的关注。

不同族群的生活和生产文化是民族共同体在世代实践过程中逐渐养成、累积并传承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些知识区分“自我”与“他者”。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于物质生产、日常生活、宗教信仰、娱乐游艺等众多方面。由于缺乏有关民族历史和传统的文字记载形式，使得民族传统和历史的保留传承更多的必须依靠口耳相传的原始方式，而教育特别是家族教育在个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更偏重于从民族的整体角度对后辈进行民族传统教育，家族的传统及历史被融入民族共同体洪流中，这与汉族家族重视本家族的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清代东北地区，满族重武轻文思想浓重，致使文化教育滞后。然而，满族入关后，当地八旗子弟一改轻视文化教育的弊病，积极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涌现了一批以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科举家族。在此种风气习染下，蒙古族子弟也积极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并参加科举考试。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家族式教育对蒙古族文化传承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而少数民族诗人虽然不处在文化核心，但他们的创作对拓展清代文坛的文化意蕴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清代中后期，蒙古族家族已经有家世与德行合而为一的趋势。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的教育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某些家族的历代不衰，也促成了文学家族产生和发展的绵延不绝。

三 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基本特征

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范畴，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讨论。首先，从时间维度来考察蒙古族文学家族的崛起，认为蒙古族文学家族经历了一个从武到文，即从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或经史世家的过程。其次，蒙古族文学

群体的构成颇复杂，就地域和族姓来分析，分别有东北蒙古、代北蒙古等几部分组成。这是一个庞大而又松散的创作群体，他们一方面各成特色，另一方面又因从龙入关，迁徙流动，促成交流融合。

与元明相比，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中能够进行文学创作或有文学作品流传于世的成员人数明显增多，不再局限于父子两代，有的一代数人甚至几代人都有文学创作，在家族内部保持了良好的文学和学术传统。就对唐诗的接受和书写来说，法式善家族及和瑛家族对王孟诗风的偏好、博卿额家族对唐诗的广泛接受、柏葭家族对杜甫诗歌的袭风、恭钊家族之恭钊瑞洵对晚唐温李诗风的偏好及锡缜锡纶兄弟对杜甫诗歌的追摹，都体现了在文学家族内部所形成的雅好诗文的家风形成后，共同养成的家学及由此衍流的家脉的重要性。

由于家族内部有意识的文化培训，共同的文义商讨，密切的交流切磋，使清代蒙古族家族成员形成了相同、相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群体，他们的作品随之呈现出明显的家族共性或群体特性。如在唐诗的影响下，法式善家族诗作都有清新自然的特色，和瑛家族诗作都有雍容娴雅的特色，博卿额家族诗作都有高蹈疏阔的特色，柏葭家族诗作都有沉郁绮丽的特色，而恭钊家族之恭钊、瑞洵展示了沉博绝丽的特色，锡缜、锡纶兄弟展示了沉雄剡切的特色，喀喇沁王家族都有娴雅冲淡的特色，表现出相似的艺术风格。这种家族共性是清代之前的蒙古族文学家族所普遍没有形成的。

相比清代汉族文学家族，蒙古族文学家族明显处于家族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有清一代，汉族家族文学盛极一时，文学家族群星闪耀，文坛俊彦层出不穷。然而正因为蒙古族家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介入，才构成了清代家族文学史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由武质而文质，由政治性而文学性，由代表性而社会性，由中央化而区域化，由经济性而形而上趋向，标志着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确立和独化。

第二节 唐诗影响下的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的动因与蒙汉文化交流关系

从先秦到清末，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语言的发展，诗歌题材不断扩大，各种诗体相继出现，表现艺术

愈益成熟，在内容、形式、风格等各方面为清代蒙古诗人的汉语诗歌创作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这其中，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巅峰的唐诗，时至今日，在国人心中的位置都是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诗歌无法比拟的。对于唐诗的接受，从最初的诗歌问世起，就绵延不绝地在诗史的长河中流淌。真正的好诗是不受时代和地域局限的。它虽然或产生于千年以前，或只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却像才脱笔砚一样新鲜，无论何时吟诵，都有清新的气息扑面。唐诗的永恒魅力就在于它不但涵养了汉民族的情趣，而且也滋润了蒙古民族的心灵。唐诗中的近体诗亦即格律诗，经初、盛唐文人定型后，其音律、词汇、句式，已积淀为古代诗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只要言及格律诗，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必须具备唐人那种丰神情韵。因此，清代蒙古族汉诗写作者在接受前人，并逐步形成自己的诗歌风格时，他们的目光会自然地凝伫于唐人唐诗。当然，清代蒙古族汉诗对唐诗的接受并非一朝一夕而成之事，与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绝大的关系。

一 统治阶层对汉化的掇扬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朝代更替时期往往是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甚至是风俗习惯的大变动时期，而各种历史因素的变化必然带来整个历史环境的变化，作为反映历史变化最直接、最形象、最全面的文学，也理所当然地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朝代更替时期的文学，也许不一定是创作上的高峰期，但肯定是文学思想、创作心态、审美趣味、文学风格等重要文学因素的大变化时期，从而显示了其变异性、过渡性与转折性等重要特征。而且朝代更替时期的文学变迁往往牵涉面非常深广，其变化常常是前一朝代各种历史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由于地域、生活方式、语言、宗教等方面接近，清朝的统治者满族人与蒙古人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满族上层很清楚，在征服和统治中原的过程中，必须重用蒙古人。在清军入关前，满、蒙之间就存在着联姻——同盟关系，满、蒙通婚已是一项国策。随着清军入关和蒙古人所辖主要地域进入清版图，满、蒙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据清朝皇家族谱《玉牒》记载：满、蒙联姻共五百九十五人次，其中出嫁到蒙古的满洲格格达四百三十二人次，娶蒙古王公之女的满洲贵族有一百六十三人。两族联姻时间长达三百年。满、蒙联姻过程中，大量陪伴人员或前往边疆地区，或来到中原内地，这些人